

王开林 著

先生

为学者不可无师，除开那些误人子弟的不称职者之外，凡具备真才实学的良师、明师、导师，方可称为「先生」，他们的精神世界值得后人探看。

先生

王开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生/王开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8
(微阅读大系·王开林晚清民国人物系列4)
ISBN 978-7-309-09882-2

I. 先… II. 王… III. 名人-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9644 号

ISBN 978-7-309-09882-2



9 787309 098822 >

先生

王开林 著

责任编辑/李又顺 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75 字数 75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978-7-309-09882-2/K · 436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自序 先生，愿为传灯者 / 1

王国维 义无再辱 / 5

梁启超 集人生六大矛盾于一身 / 33

陈寅恪 不疯魔不成活 / 67

赵元任 天生快活人 / 91

吴宓 为情所困 为情所苦 / 115

先生，愿为传灯者（自序）

清华国学研究院创设于1925年初春，由吴宓出面组织，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应聘为导师，李济应聘为特别讲师（其后还有马衡、林宰平加入）。在六人当中，最年长的是梁启超，五十二岁；最年轻的是李济，二十九岁；再看其他人，王国维四十八岁，陈寅恪三十五岁，赵元任三十三岁，吴宓三十一岁。这些国学大师个个正值盛年。

清华国学研究院规模不大，活力却十分充沛。四位导师冠绝一时，王国维的甲骨文考证，梁启超的清代思想史、学术史，陈寅恪的中古史，赵元任的语言学，在当时均属不二之选。

王国维第一个告别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6月2日，

端午节前两天，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留下遗书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中的这十六个字颇费猜详。殉清乎？尸谏乎？因家变而死乎？悲观厌世乎？为求“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而死乎？数说并存，群疑莫解。在那个年代，学者看不到精神出路，因此自寻短见，王国维固然是最突出的代表，但并非第一人，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便曾抢先数步，于1918年11月14日投北京积水潭自尽。

梁启超是学者，是报人，是作家，是政治家，他身上附丽的色彩十分驳杂。梁启超那支常带情感的魔笔启发过两三代人，他文思泉涌，不见枯竭，他理智风行，可化顽石。维新，保皇，排满，流质数变，最终拥护共和，“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他与时俱进，自我更新，既是充满矛盾的人，又是解决矛盾的人。梁任公春风风人，化雨雨人，提携晚辈，尤其不遗余力。胡适称赞他为“可爱的长者”，徐志摩则以列于梁任公门墙之下为殊荣，都很能说明问题。

陈寅恪的学问如何？吴宓与之交往半个世纪，最有发言权。在《空轩诗话》中，吴宓回忆他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初次见面，这样写道：“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

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只要大傲哥钱锺书肯服气，这句话就能百分之百地成立。陈寅恪一生遭际悲辛，饱经忧患：祖父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积极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惨遭“革职，永不叙录”的严厉处分，这位四觉老人的自缢身亡也被坊间认定为慈禧太后的“密旨”所致；父亲陈三立愤于日寇侦伺，绝食而死；兄长陈衡恪因寒湿侵身，英年早逝；至交王国维投水自尽，幽明永隔；再加上他的眼疾、足疾长年为患，乱世的颠沛流离，以书易炭，怀璧获罪。在“文革”期间，其助手被撤，牛奶被断，账户被封，高音喇叭架于户外，大字报贴于床头，一代大师陈寅恪遭此奇祸，令人欷歔。

四人中，赵元任的人生最为圆满，尽管他少年时期就痛失慈母严父，但后来的路走得一帆风顺，称他为“天生快活人”，是不会有错的。他中年出国，在美利坚多所高校任教，著作等身。这位语言学界公认的斫轮老手通晓十余种外国语言和三十多种中国方言，“赵先生永远不会错”，美国语言学界对他有如是之崇信。他能谱曲，能作方言旅行（相当于口技），能用一大堆同声同韵单音字创作幽默故事，可谓多才多艺。

算起来，除了陈寅恪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相始终，王国维、

梁启超、赵元任都是中途（或去世或出国）离开。“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惊艳的一笔。前后招考录取七十四人，绝大多数人日后成为学界栋梁。”其中有王力、陆侃如、吴其昌、姜亮夫、谢国桢、杨鸿烈、高亨、刘节、蒋天枢，他们撑起了中国学术的一片蓝天。

为学者不可无师，除开那些误人子弟的不称职先生，凡是具备真才实学的良师、明师、导师，即为学术的传灯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值得后人探看，再探看。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七十四位门徒是幸运的，当年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能够拜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门下，哪怕只上过其中几堂课，也是超值的人生体验，何况他们亲承警发，少则半载，多则四年呢。

王国维

义无再辱

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

1926年9月26日,由于“中西两医并误”,王国维(1877—1927)的大儿子王潜明患伤寒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二十七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元配莫氏所生,莫氏病歿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甚服帖,他妻子罗曼华(孝纯)与婆婆也多有抵触,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犹如“金人”一个。罗振玉一向视女儿孝纯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不少委屈,心中老大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失和,皆因王国维偏袒潘氏,遂使继室养成雌威。对此严厉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辩解。此外,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后,赁居上海石库门一所凶宅,风水不佳,别人在意,他不在意,及至他北上应聘清华讲席,仍让新婚的长子长媳住在原先那个鬼地方,以至于好端端的儿子暴疾而亡。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潜明生前服务于海关,死后获得一笔抚恤金,再加上一个月工资和罗孝纯变卖首饰所付的医药费,合计三千元,王国维将这笔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于1926年10月31日写信给罗振玉:“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

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连这样愤激的重话都讲出来了，离撕破脸只隔一层纱。罗振玉竟罔顾旧情，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从书房中清理出大沓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信上分明写着“静安先生亲家有道”“观堂亲家有道”之类的字样，都是罗振玉的亲笔。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欲绝。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第三十五号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即趑进园子。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清朝帝后避暑消夏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景色，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阙）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深广的精神依恋。只是今天很

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袅袅腾腾的烟雾间，陷入沉思。

1917年6月，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觊颜（tiǎn yán，厚着脸皮）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可张勋并没有自尽，躲在荷兰大使馆长吁短叹，怨天尤人。

1924年冬，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mín）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旧军阀冯玉祥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唯有一死，

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

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

巨大的精神痛苦使我们对肉体的痛苦感到麻木；我们鄙视肉体的痛苦；不，如果肉体的痛苦超过精神的痛苦，那么它就会分散我们的心思，我们欢迎它，因为它中止了精神的痛苦。正是这种感觉使自杀变得容易。

王国维曾作《教育小言十则》，其中第八则将国人废学之病归咎于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曰运动狂，曰嗜欲狂，曰自杀狂”。患此狂疾，则一生万事皆休。第九则他专论自杀，讲得更透辟：“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至于自杀的事，我们暂且不论它的好坏如何，只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观察，若不是力量不足以达成志愿而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就一定是他们的意志力不能制衡一时的感情冲动，然后才做出这样惨痛

的事情来。”

都说，勇者无畏，智者无忧。难道王国维不是智者吗？问题就在于，他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打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纂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竟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

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落叶，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投水者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顷刻间即已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他一直在园外静候，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撒腿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

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入殓之后，众亲友弟子扶柩停灵于校南的刚秉庙。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清华学校教授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和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燕京大学教授容庚。1927年7月17日，家属遵照遗命，将王国维营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的麦垆中，送葬者，自曹云祥校长以下数十人，多为学界名流。

王国维自杀后，最感到愧疚和后悔的要数罗振玉，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学术上的畏友和政治上的盟友，还永远失去了一个与密友和亲家消释嫌隙的机会。出于补救心理，罗振玉画蛇添足，伪造了一份王国维转呈逊帝溥仪的遗折，通篇皆是孤臣孽子的口吻声气，不乏忠谏之词，溥仪读后大为感动，遂颁下“上谕”，加恩“谥予忠愍（què，诚实）”，并赏赐给王国维家属陀罗经被一床，治丧费二千元。

1927年8月25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手持鲜花，带领学生数十人前往王国维墓地斟酒祭拜，他的悼词充分肯定王国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的死因：“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这一途。”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